

首席评论

老房子要“强制体检”更要“医养结合”

张西流

越来越多城市的老房子,要“强制体检”了。郑州、长沙、天津、沈阳、南通等地陆续发布了房屋“体检”方面的管理办法和技术导则。在不少业内专家看来,城市住宅楼龄不断增长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国家的政策要求,是此次多地出台老房子“强制体检”的重要原因。但检测过后,如果发现房屋存在安全隐患,维修的钱又该从哪里出?相比“体检”费用,维修费用则高得多。事实上,在全国不少城市,楼龄较高的不少住宅楼,都面临没有维修基金或者维修基金不足的问题。(12月22日《中国新闻周刊》)

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步入深化阶段,城市发展的重心,正从“增量扩张”转向“存量更新”。在这一背景下,大量建成年代久远、结构老化、设施落后的老房子,成为城市安全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潜在隐患。近期,多地出台政策推动对既有住宅开展“强制体检”,这无疑在城市治理精细化的重要一步。然而,体检只是起点,真正让老房子“延年益寿”,更需推行“医养结合”式的系统治理,方能实现

安全、宜居与可持续的有机统一。

所谓“强制体检”,即由政府主导,对达到一定使用年限或存在结构风险的老旧住宅,进行定期安全评估,排查地基沉降、墙体开裂、管线老化等隐患。这一举措源于近年来多起建筑安全事故的警示,体现了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的治理理念。通过制度化、标准化的检测机制,可提前发现风险,避免“小病拖大、大病拖垮”。从政策角度看,强制体检是城市安全底线思维的体现,也是政府履行公共安全管理职责的必然要求。

但“体检”之后怎么办?若只查不治,或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,则难以根治老房子的“慢性病”。这就引出了更深层次的治理逻辑——“医养结合”。所谓“医”,即针对检测出的问题,实施精准修缮、结构加固、功能提升;所谓“养”,则是建立长效维护机制,包括日常巡查、居民共治、资金保障、技术支撑等,实现从“被动抢险”到“主动养护”的转变。

“医养结合”的智慧在于,它超越了单一工程思维,转向系统治理。例如,某老旧小区经体检发现电路老化、消防通道堵塞,若仅更换电线、清理通道,可能治标不治本。而“医养结

合”则会同步推进加装电梯、增设适老化设施、引入物业管理和社区养老服务体系,既解决安全隐患,又提升居住品质,尤其惠及老年居民。这正是城市更新“以人为本”的深层体现。

从政策实施层面看,“医养结合”也面临挑战。资金从何而来?可探索“政府引导+居民共担+社会资本参与”的多元投入机制;技术如何保障?需建立专业评估队伍和标准化修缮流程;居民意愿如何协调?必须强化社区协商与公众参与,避免“政府干、群众看”。“医养结合”还应纳入城市整体规划。老房子不仅是物理空间,更是城市记忆与文化肌理的载体。在修缮过程中,应注重保留历史风貌,避免“千楼一面”。同时,结合城市15分钟生活圈建设,将老房改造与社区服务、绿色低碳等目标融合,实现“安全+宜居+文化+可持续”的多维提升。

老房子的“强制体检”是警钟,更是契机。唯有以“医养结合”的系统思维推进治理,才能让老房子不仅“活下来”,更能“活得好”。这不仅是建筑的更新,更是城市治理能力的升级。当每一栋老房子都能被科学“诊疗”、温情“养护”,我们的城市才真正拥有了温度与韧性。

漫画新闻



通报醉驾典型问题

■12月20日,湖北省纪委监委通报5起党员干部醉驾典型问题。

新华社发
朱慧卿作

百姓看法

“无继承人”逝者身后事亟需建立明晰规则

舒爱民

上海虹口区46岁独居女子蒋女士12月14日因病离世,她父母早逝,未婚无子女,在没有监护人和继承人的情况下,其遗产依法将由民政部门接收。其远房表弟吴先生希望用遗产为她购置墓地并举办追思会,但虹口区民政部门表示:该支出需在合理范围内且具体标准需经法院审理确定。12月21日,上海虹口发布通报,称相关善后工作正稳步推进,全力守护逝者尊严、保障相关权益。蒋女士所在居委已与蒋女士生前单位、远亲联系,所在居委将在与相关方充分协商基础上作妥善安排,预计12月底前举行告别仪式。(12月22日《潇湘晨报》)

这一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,也暴露出我国在应对“无法定继承人”群体身后事处理上的规则缺失与现实困境。

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、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婚育观念转变,像蒋女士这样的独居、无子女、无近亲属的群体正逐渐增多,他们生前独立生活,身后却面临“无人送终”的尴尬。《民法典》规定,在无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情况下,遗产归国家所有,用于公益事业,实际操作中多由民政部门代为管理。然而,法律并未细化遗产在清偿债务后的具体用途,尤其对丧葬支出的范围、标准缺乏明确指引。于是,当亲属或好心人提出用遗产支付墓地、追思会等费用时,便陷入“于情合理、于法无据”的窘境。

殡葬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遗体处理,更承载着文化传统、情感寄托与社会尊严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“入土为安”“慎终追远”是根深蒂固的伦理共识。即便逝者无直系亲属,为其体面送行,既是对其

人格尊严的尊重,也是对社会人伦底线的守护。当前,民政部门在处理此类事务时,往往出于规避责任风险的考量,倾向于“最小化支出”“程序化处理”,导致个案缺乏灵活性与人文化关怀。蒋女士所在居委虽已介入协调,与生前单位、远亲沟通,并计划在12月底前举行告别仪式,体现了积极态度,但这种“个案协商”模式难以复制推广,也无法形成稳定预期。社会治理不能长期依赖“通报回应”或“舆论推动”,而应建立常态化的制度安排。

因此,亟需为“无法定继承人”的身后事建立明晰规则。首先,应明确遗产在清偿债务后,可优先用于支付合理、必要的丧葬费用,包括遗体接运、火化、骨灰存放、墓地购置及追思仪式等,具体标准可结合当地殡葬指导价和遗产规模设定上限。其次,应建立“临时遗产管理人”制度,允许逝者生前所在单位、远房亲属或生前关系密切者申请临时管理权限,经民政部门审核后,授权其在一定范围内处置遗产用于丧葬事宜,事后接受监督与审计。再次,鼓励独居者生前通过意定监护、遗嘱等方式提前安排身后事,政府可提供法律援助与登记服务,提升自主决策能力。此外,民政、司法、社区居委等多部门应协同建立“孤独终老”群体关爱机制,将殡葬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,探索由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的公益性殡葬支持体系,避免个体善意成为唯一依靠。

我们不能总在悲剧发生后才被动应对。唯有建立清晰、人性化、可操作的规则,才能让每一位孤独者,即便无亲无故,也能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。这不仅是法治的进步,更是文明的温度。愿她的告别,能成为制度进步的起点——让每一位独居者,都能在生前被关怀,在死后被体面安放。

第三只眼

“图书盲盒”惊喜可有深度阅读不可失

江德斌

从书店特制牛皮纸袋到直播间即时搭配,图书盲盒正在年轻人中掀起风潮。有人借此拓宽阅读边界,有人为情绪疗愈买单,也有书店靠它清空库存。当书籍成为被包装的“惊喜”,是在打破信息茧房,还是在为情绪消费?盲盒能否真正推动深度阅读,正成为图书行业与读者共同面对的新课题。(12月21日《工人日报》)

图书盲盒正悄然重塑着当代青年的阅读习惯与消费图景,这种融合了盲盒经济与纸质阅读的新形态,本质上是当代青年阅读需求与商业创新的共振。在快节奏、高压力的生活中,年轻人既渴望“开卷有益”的获得感,又期待“拆盲盒”般的惊喜体验,图书盲盒点燃了部分读者的探索热情,却也引发了对“阅读是否正在被娱乐化”的深层忧虑。

不可否认,图书盲盒在特定情境下具有积极价值。对困于信息茧房的年轻人而言,它提供了一种“被动破圈”的可能,放下算法推荐的精准围猎,让专业选书人代为挑选,或许能邂逅一本从未列入视野却直击心灵的好书。对独立书店而言,在实体经营步履维艰的当下,盲盒成为清库存、增流量、维系社群的有效手段。而且,图书盲盒具有不确定性,消费者拆开一个装着未知图书的纸袋,确实能带来片刻的精神慰藉,所以也是为情绪买单。

然而,若将图书盲盒视为推动全民阅读的主流路径,则无异于缘木求鱼。其根本矛盾在于阅读的本质是主动思考,而盲盒逻辑是被动消费,当书籍被简化为情绪商品,其作为思想载体的严肃性便面临消解风险。更值得警惕的是,部分商家为追求复购率,刻意制造稀缺感、限量款,甚至将畅销书重新包装成“神秘典藏”,实则仍是营销套路。久而久之,读者可能习惯于“被喂养”的浅层阅读,丧失自主选书、深度沉浸的能力。

图书盲盒热潮的背后,折射出当代阅读生态的双重困境,一边是信息过载导致的选择疲劳,一边是注意力碎片化催生的即时满足需求。人们渴望好书,却不愿花时间甄别,向往深度,又难抵“开箱即得”的诱惑。在此背景下,盲盒成了看似两全的折中方案,但却未必最优。

因此,图书盲盒不宜成为出版发行的常态化模式,而应定位为短期、有限、有引导性的文化活动。书店或平台可将其作为“阅读引路人”,在盲盒中附赠选书理由、延伸阅读书单或共读邀请,将一次偶然的“拆封”转化为持续阅读的起点;也可结合主题策划,以盲盒为入口,引导读者进入系统性阅读。

图书可以盲选,思想不能盲从。真正的阅读,从来不是拆开一个盒子就完成的仪式,而是一场需要耐心、思辨与孤独的跋涉。我们欢迎图书盲盒带来的一时涟漪,但更期待它能激起读者心中那片深邃的湖,在那里,没有标签,没有算法,只有文字与灵魂的直接对话。